

博物馆化的拓展:原因、进程与后果

严建强 毛若寒

(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人类对一些物品产生特殊情感,源于在其中发现了价值与意义,即“博物馆性”。确定了博物馆性,通过博物馆化的行为将其与现实时空分离,“物”转化为“博物馆物”,这就是人类的收藏。随着人类的认知深化及收藏活动的社会化,人类在越来越多的物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性”,博物馆物的数量与类型出现持续扩张,这一过程就是“博物馆化的拓展”。持续的拓展导致种类繁多的博物馆的诞生。随着物作为意义载体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及机构性收藏成为主流,博物馆物被视为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并被赋予更高的传播使命,由此深刻改变了博物馆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相应地带来博物馆组织结构,展览建设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一系列变化。

关键词:博物馆 博物馆化 博物馆性 收藏 博物馆传播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en Hooper-Greenhill)在描述博物馆的急剧变化及人们面对这些变化所表现的态度时写道:“在过去几年里,博物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重组。变化是极端和迅速的。对许多热爱博物馆的人来说,这种变化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出乎意料的和不可接受的。它抛弃了以前关于博物馆性质的假设。”^[1]她认为,令许多业界人士感到震惊的原因是对博物馆的身份始终抱有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看法,为此,她指出,“如果认为博物馆只有一种形式的现实、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那就大错特错了”^[2]。

格林希尔指出的部分从业者面对变化所表现出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不过,也应该看到,在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中,变化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由来已久和持续的,且变化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突然、不确定和难以预料,其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若对这一变动的历史做更仔细的梳理,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博物馆持续、深刻和多方位变化的原因,与一种我们称为“博物馆化拓展”的现象有关。正是这一持续不断的拓展给博物馆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

的问题,从而导致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功能及其内部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与方法等一系列变革。博物馆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持续的突破和再平衡的交替运动中进行的。鉴于此,探明博物馆化拓展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就成为我们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并采取积极和明智行动的可靠依据。

一、博物馆化与博物馆性

“博物馆化”是捷克博物馆学家斯贝尼克·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在尝试构建科学博物馆学体系时所提出的概念。作为一名教授博物馆学的大学教师,他明显感受到来自理论思辨横向比较的压力。按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知识理论,作为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稳定与永恒的特质。如果将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17世纪之后成长起来的博物馆机构,那显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也不能被称为科学学科。博物馆化正是他为此所寻找的具有稳定与恒久性的研究对象^[3]。在他看来,博物馆化是人类对物的一种独特的认知与态度,其本质是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使“物”转变为“博物馆物”。这是一

收稿日期 2019-10-09

作者简介 严建强(1955—),男,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毛若寒(1993—),男,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种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在人类形成后即出现,并且不会因机构的消失而终止。为此,斯坦斯基认为博物馆学是一门明确且独立的学科(scientific discipline)。其认识在于人类对其现实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特殊手段在客观层面透过历史上不同的博物馆表现出来,它同时也是记忆的系统表现与局部反映^[4]。

博物馆化何以发生?其心理学依据如何?由于收藏的对象是物,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物”及人类对物的态度。

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借助“物”而达成目的。为此,人们在行事之前首先要制造物作为工具与用器。格林希尔的同事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在谈及物时做了语义学分析,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第一,物件可以被当作物质器物(material artefact),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视角;第二,物件可以被当作符号(signs)和象征(symbols),创造分类和传输可读信息;第三,物件可以根据含义(meaning)来研究^[5]。从物所承载信息的角度来看则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器物基于实用功能的目的而制作,人们在制作时并没有传播学的思考,物是纯粹的实用器。然而,在物的使用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有意义的故事,物就像海绵一样吸纳不断增加的相关信息:成为某一事件曾经发生的证物,抑或成为某种已逝情感的寄托。在这种场合下,它们在不经意间成为意义的载体。另有一类物,人们在制造时已带有某种传播学的诉求,比如一些物品上有符号或图像,其意义正是物品制造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又如某些意义的表达是通过材料、形状、色彩,或刻画于其上的纹饰。如果说前一种物所传递的是无意信息,那么后一种物所传递的则是有意信息。无论哪种类型,它们都具有超越物质功能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

物的这种特征使它在提供实用功能之外可对人的情感发生作用,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态度。当人们与物产生情感关联后,物的功能就被改变,被赋予精神或文化的价值。我们可以将这种对物的喜爱并渴望拥有和珍藏的情感称为“博物馆情感”(museum emotion)。换言之,导致博物馆情感的原因是人们在物中发现了对自己而言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斯坦斯基将这种意义与价值称为“博物馆性”(museality)。正是这种情感和价值判断导致了人类的独特行为:将物从它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中分离出来并妥善保护。这一将

物与其现实时空分离的过程就是“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通过博物馆化,“物”(object)转化为“博物馆物”(museum object)。

博物馆性是理解收藏文化与博物馆文化的关键概念。正如弗德利希·瓦达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在《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的观点》中所指出的,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博物馆或博物馆的收藏,而是博物馆性^[6]。在人类收藏史上,收藏品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持续的拓展与扩张,其关键原因就是博物馆性的开放性和泛化。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类对物是否具有博物馆性的判断变得越来越敏感和宽容。这种敏感性与宽容性导致收藏动机的不断强化。之前被认为普通的物品,由于敏感性的增加,人们便发现其中蕴含的意义和价值,收藏的动机也随之产生。由此,越来越多的物转化为博物馆物,人类的收藏无论从数量还是类型,都出现极大的增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精神性成长。就如我们从孩提时代走向成熟,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由表面向内部深化。随着这种精神性成长,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断增强,收藏意识更趋成熟,更善于从物中发现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使博物馆情感变得炽热。另一个原因则是收藏的社会化。早期的收藏多为个人或家族行为,收藏目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收藏与保护能力也颇为有限。宗教团体的收藏虽具有社会属性,但很少超出宗教的范畴。近代社会形成后,伴随着收藏主体扩展到学术团体、学校、企业、基金会及政府,收藏成为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为。不仅收藏视野极大扩张,保存能力也大大增强。这类收藏行为带有明确的保存社会记忆的目的,并负有向公众传播的使命。因此,对博物馆性的判断,不是从个人的情感而主要从社会的需求出发。从某种意义而言,个人的博物馆情感(museum emotion)逐渐被社会的博物馆意识(museum consciousness)取代。

二、博物馆化的拓展

随着收藏品进入交换领域,藏品变成一种特殊商品,既能满足收藏者的精神需求,也具有保值与增值的经济价值。人们通常将这些来自古代的收藏品称为“古董”。古董在汉语中多指古人所遗之精华。“古”是指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董”则有经典之意。古董进入流通领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可移动的,否则无法在市场中交易;其次,“物件”必须具有三维空间的物质属

性,而非抽象和无形的。

人类收藏史的演进以此为原点,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兴起而逐步展开。这一进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最具实质性的仍体现在博物馆化的拓展上,这一拓展经历了从经典到日常、从可移动向不可移动、从物质到非物质及从过往到现生的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带来了新的增量和类型。

第一是从经典到日常的博物馆化拓展。早期的精品型收藏主要关注美丽珍贵的事物,相应地产生了精品定位的艺术类博物馆。这类物品通常是各时代人类文明的代表性杰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而受到经久不息的追捧^[7]。在这类博物馆中,人们主要出于审美和欣赏的目的观看实物展品。在展品体系上,其属于单一实物展品要素体系,展览的质量判断主要依据物件观赏环境的营造,包括清晰性、珍贵性、舒适性等,其建设的运作相对简单。

随着区域社会的形成,之前具有从属性的人际关系开始被一种以地缘为基础的社区关系取代,人群与特定地域形成了亲密和稳固的关系。人们开始建立地方历史学会、撰写志书,希望通过整理文献和收集文物来探明本地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特征^[8]。这类收藏更关注物品作为记忆载体的身份和价值,它们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能够有效证明本地曾发生的事件和现象。它们包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品、各种贸易和职业生活中的契约和文件,以及各种反映信仰的物品。这些物品都与这片土地联系密切,早期收藏中“英雄不问来路”的泛地域特征不复存在,物品的“在地性”成为收藏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这类博物馆负有明确的传播使命,有责任向观众讲述这片土地与人们的故事,为他们梳理历史的脉络并增强社区的文化认同。与此目标相关的博物馆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类型,包括地方博物馆、方志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以及以本地有关人物与事件为主题的纪念馆等。此外,为自然科学研究而进行的收藏,为发展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而征集的各类物品等,都体现出去精英化的色彩。对收藏对象的博物馆性判断,也越来越强调其作为日常生活/现象记忆载体的价值,同时也强化了从审美与欣赏向学习与理解转变的倾向。

第二是从可移动遗产到不可移动遗产的博物馆化拓展,这与工业革命及近代社会的形成有关。随着建筑材料从石木等自然材料向钢筋混凝

土与玻璃的人工材料转变,人类的居住条件变得更便利与舒适,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最突出的案例是法国波拿巴三世(Napoléon III)对巴黎城的改造。在这种大拆大建的浪潮中,许多人们熟稔的景物迅速消失,居民变成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人。这种现象引起了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警惕,在他的呼吁下,法国政府于1840年颁布了世界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案,开启了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不可移动遗产进入保护清单,我们可称之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其过程通过相应的法律文件来实现。在日益明确不可移动遗产重要性的背景下,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孤立存在的建筑和构筑在失去语境后实现其价值的困难,遂逐渐扩大保护范围,出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拓展。这种不可移动遗产的博物馆化不仅表现在人文历史方面,在自然方面也有大量的遗迹和保护区被要求尽可能以保持原状的方式进行保护。

在这一种拓展浪潮中,被卷入博物馆化的物品带来了新的博物馆类型,除了故居、事件现场纪念馆、考古遗址博物馆、自然遗迹博物馆之外,另有两种影响颇大的博物馆:露天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前者是一种将各地孤立落单的历史建筑易地重组,再用展演的方式再现历史生活,属于非原生态、非原生活的博物馆类型;后者则是完整地保持原有的建筑及格局,让原居民按照传统的方式生产与生活,既保留了建筑的原生态,也保留了居民原先的生存方式,属于原生态、原生活的类型。

第三是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拓展。这个突破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率先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包括普通的无形文化财(戏剧、音乐、工艺技术)和无形民俗文化财(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信仰、节日、风俗习惯和民俗艺能等)。这一做法得到了韩国和中国的积极响应,韩国的“人间国宝”(living human treasure)和中国的“传承人制度”相继问世。在美洲和欧洲,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一突破意味着博物馆化突破了物质的藩篱进入新阶段,但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可移动遗产和不可移动遗产都具有三维空间的物质属性,博物馆化将物与其现实时空的分离可通过收藏和立法的行为来体现,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来说无疑是一个难点。既然是无形

的,就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分离动作来实现。无形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以人的文化行为为载体的过程性现象,当人的行为停止了,这一可观察的现象也就消失了。所以,对于这种现象的感知,既不可以超越空间,也不可以超越时间,必须满足“在地的”和“即时的”条件。如果不是身处现场,那就必须通过记录与播放设施。基于这一特点,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就需要通过现场展演或装置对原发过程进行记录与播放。对于这类以过程性现象为特点的遗产收藏,通常要借助于录一播装置,所收藏的实际上是一种“现象—装置”的结合体。

第四是从过往向现生的博物馆化拓展。在人文历史博物馆领域,长久以来人们都奉行物“以古为贵”“以稀为贵”的理念。不过在今天,各种反映行业现状和当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物品等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至于自然博物馆领域,其在兴起时就表现出对现生世界的关注,所收藏的去生命化的动植物标本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到现在,自然博物馆的博物馆化拓展出现了新现象,表现为不再局限于标本孤体,而将标本视为一个系统,比如在征集鸟类标本时,

人们也收集它们的巢,并录下其鸣声;又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活体展品等。

在过往向现生的拓展中,另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现实生活中业已出现的“社会生活博物馆化”的趋势。这种博物馆化的过程并不是前文所述的一个具体行为,而主要表现为一种观念。比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建立了参观廊道,当一位对现代金融生活不甚了解的人在廊道观察正在交易的人们时,这些交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博物馆物”,他们的行为变成为人们理解当代金融活动的展品和教科书。这种博物馆化并不伴随着相应的行为和动作,仅通过观念实施,我们可将此理解成博物馆化的一种隐喻方式。

通过上述四个环节的突破,博物馆物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类型也极为复杂和多样化。从内容上看,我们将这些物品分成“自然”与“人文”两大部类。这两大部类又都包含“过往”和“现生”两大部分。从存在形式看,它们有“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和“无形的”三种类型。将这三个要素进行组合,就形成博物馆物的清单(表一)。

表一// 博物馆化拓展中不断增长的博物馆物

人文历史类博物馆物					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物				
可移动的人工物		不可移动的人工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移动的化石、标本与活体等自然物		不可移动的自然物与现生环境		非物质的自然现象与科学原理
过往	现生	过往	现生	现生	过往	现生	过往	现生	现生
古典艺术作品	当代美术作品	考古遗址	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样本与物质支持系统	反映生命演化的化石	去生命化的动物、植物标本	自然史遗迹	典型自然景观与保护区	再现与观察自然现象的装置(风、雨、雷、电、磁、声、光)
历史与考古学物品	当代产品与用品	故居、历史事件纪念地	文化空间、文化景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播放装置(录音、录像等)	反映地质运动的岩体、矿物	活体标本(动物园、水族馆、博物馆)	典型地质剖面		阐释科学原理的装置(数字、物理、化学、生物等)
历史文献类物品(方志、古籍、档案等)	当代文件类物品与记录材料					微生物样本及观察装置			

以上是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化拓展的成果。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领域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拓展有关。

三、博物馆化拓展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回到格林希尔所谈到的现象。博物馆持续的(有时是急剧和迅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博物馆化的拓展有关。这一拓展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博物馆物的增长导致了博物馆类型的丰富化,新兴博物馆履行传播使命又为博物馆的组织机构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大量以学习与理解为宗旨的博物馆的出现又为展览建设带来新挑战。

(一)引发博物馆家族的急剧扩张,呈现出类型多样的博物馆世界

博物馆化拓展带来的最明显后果是博物馆家族的急剧扩张:上述每一类博物馆物都形成了相应的博物馆,并形成以下博物馆类型清单(表二)。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列举的博物馆类型是依据藏品的学科属性而分类,是一种被理论概括的纯粹形式。在现实中,博物馆除了依藏品学科属性外,还有按管辖机构的级别、按藏品所有及经营的主体,以及按主要服务对象等分类。另一些博物馆呈现出多学科混杂的综合样式。例如,地方博物馆通常就包含各种藏品类型的综合内

涵,既有人文的、也有自然的,既有过往的、也有现生的,既有物质文化的、也有非物质文化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家专题博物馆可能只涉及某一学科领域内很小的、很专门的一部分。这种复杂的组合和细分使得现实世界的博物馆五花八门、多样纷呈。

(二)导致博物馆定义处于持续和长久的争论中

在早期博物馆类型相对单一的情形下,博物馆定义容易包含各种类别。博物馆类型剧增后,要确定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变得困难。从管理角度而言,定义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准入决定权,符合定义即可成为成员。随着博物馆化的拓展,新成员不断出现,但其中一些成员与原先成员区别很大,不仅原先的成员感到诧异,理论界也颇感棘手。

不可移动遗产进入博物馆物的范畴,尤其是大型的文化空间如考古遗址、自然遗迹、生态博物馆等,与传统的室内博物馆大相径庭,博物馆如何将它们纳入定义中?“机构”是否依旧是一个适宜的词汇?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并进入博物馆后,由于它们并不具有三度空间的物质属性,原先的博物馆定义中所强调的“物”的属性是否还能坚守?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进入使原先展品的去生命化特点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现

表二// 在博物馆化拓展中衍生的博物馆家族

人类历史(过往)		人类生活(现生)			自然历史(过往)		自然环境(现生)		
可移动文化遗产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	可移动文化遗产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移动遗产	不可移动遗产	可移动遗产	不可移动遗产	非物质现象与原理
历史博物馆(艺术、科技、文化、社会等)	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考古遗址等)	艺术博物馆(造型艺术、摄影、工艺、民艺、戏剧、音乐等)	文化景观博物馆(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自然史博物馆(地质运动、生命演化等)	自然史遗迹博物馆(大型化石发现地、典型地质剖面等)	自然博物馆(动物、植物、微生物、矿物等)	自然景观博物馆(山系、水系、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	科学中心(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考古博物馆		行业与技术博物馆(产业、教育、体育、影视、医药、军事等)					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		
古文献博物馆(古籍、档案、方志等)									
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									

生和活体标本进入后,“遗产”这一概念是否依旧适用?科学中心也带来了新的困惑。在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看来,艺术博物馆是一座神庙,而科学博物馆却是一所学校,两者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这两个领域是不可调和的^[9]。的确,从实物藏品的角度看,两者正好各执一端,艺术博物馆展品几乎是清一色的实物展品,而典型的科学中心几乎全是为展览专门设计制作的装置。在这种情形下,博物馆定义能否为两者都发放准入证?

从功能上看,随着博物馆化拓展和新型博物馆的加入,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博物馆很少会自觉承担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的责任。但在自然科学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类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等都承担了大量的科研任务,有些甚至成为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心,于是,在博物馆定义中就增加了这方面的任务。随着地方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的兴起,博物馆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教育职能。面对这样的现实,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改变了定义中研究与教育的位置,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

可见,博物馆化的每一次拓展、每一次新的博物馆物和新的博物馆类型的诞生都会为博物馆理论界带来新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持续修改中的博物馆定义正是理论界对博物馆化拓展的现实所作出的响应。

(三)导致建筑形态及营造程序的变化

博物馆化拓展的影响不仅限于理论或观念层面,而是渗透到实际运作的各方面及作为运行基础的场馆建设上。新博物馆类型的增长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博物馆建筑的形态及营建程序。早期藏品和展品基本属于精致小巧的可移动物品,对展览空间没有特殊的要求。随着新类型博物馆物的进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从实物展品看,一些大型的工业产品、生物标本、民俗与民族学物品的进入,对展览空间提出了新要求;从非实物展品看,作为不可移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理者,包括大型复制品、情景再现的大型媒体技术、大型操作互动和体验装置等也有各自的技术参数;从深化拓展教育的目的看,辅助性阐释与叙述的电影院、小剧场及各种拓展教育项目都使得建筑的功能性结构变得非常复杂。这种复杂的、非标准化的结构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化设计方法,而必须先行调查资源特征与规模,初步设定

表达方式和审美风格,然后才能确定建筑的规模、形制、组合关系和特殊空间。在这类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总规划(master plan)就成为保障质量的必要环节。只有在充分明确了上述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写出可行的、有效的建筑设计任务书。

(四)导致展览建设的一系列变化

展览的变化包括目标、功能、题材、理念与方法,是博物馆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中最突出和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这一切都与收藏动机有关,而收藏动机又取决于博物馆性的判断。博物馆化的拓展正是博物馆性判断不断宽容和泛化的结果,在博物馆展览建设的以下诸方面体现出来。

1.展览要素的复杂化

博物馆类型的增长导致展览要素复杂化。在传统的以艺术精品为主体的展览中,展览要素是单一的,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一统天下,为“单一的实物展品要素体系”。但随着不可移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人类收藏的视野,它们也成为博物馆讲述土地与行业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由于它们不能亲身前往,所以通常采用造型与媒体的方式进行再现。另一方面,有时为了对展品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也会采用造型物、媒体和装置等进行辅助。随着造型、媒体和装置的进入,上述单一的实物展品要素体系也被改变了,出现了“多元混合的展品要素体系”。也就是说,以往的展览都是用实物构成的,而现在的一些区域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等主题类博物馆为了更好地阐释和叙事,其展品中既有“实物”、也包括造型与媒体等“非实物”。博物馆与展览类型的多样化不仅导致展览要素的复杂化,也强化了前文提到的展品的非标准化特色,这给展览的制作带来了大量新问题。

2.策展内涵的复杂化

在传统的美术馆,策展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作重点是提炼主题、组织展品。由于艺术作品主要满足于人们的审美与欣赏,且作品本身就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和自明性,策展人对展品的阐释责任并不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加上单一的实物要素展览机构比较简单,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建设的过程比较接近标准化工程,策展与设计的难度相对较小。但随着以学习与理解为宗旨的博物馆的兴起,许多展品不再是精美的艺术品,而是记忆的载体。这类展品的价值与意义蕴藏在物的深处而较难被理解,所以,对它们进行阐释就成为策展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另外,以阐释与叙事

为特征的主题性展览,其展品要素变得复杂多元,非标准化增强也使策展工作变得复杂,例如如何确定主题、选择展品,如何将展品组织成一个有效实现传播目的的有机系统,如何让观众通过观察与阅读理解展品的内涵。博物馆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在策展环节需由策展人、释展人和设计师构成的团队运作。

3.质量保障的复杂化

在这个复杂的、以非标准化为特征的营建过程中,如何有效保障展览品质也变得格外复杂。在以欣赏为主的展览中,由于人们的审美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难以对观展获益进行度量,只能满足于观众的一般性印象。但对以科学普及为使命的博物馆,揭示事物真相、传递科学知识是其职责所在,如在历史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许多过程、原理和技术已在研究中得出结论,那么展览的传播效益及观众参观受益程度就成为验证博物馆质量的核心维度。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优质的策展,而且要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将其落到实处。为此,博物馆界建立了包括前置评量、形成中评量和总结评量三大环节的质量保障系统^[10]。

在博物馆建设程序上,为保证策展人的意图能贯彻落实,标准化工程的分阶段实施方法显然不再适用。一方面,经过不同阶段的易手,策展思路会在不断的变化中发生偏离;另一方面,各阶段易手会由于缺乏单一的责任主体而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博物馆营建中缺少形成中评估环节的背景下,制作团队即便发现二维设计图中的问题也不愿作出积极修改,使设计缺陷进入产品中,从而影响展览质量。为防止这种现象,许多国家采用了总承包制,在始点进行招投标确定团队,由该团队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保证策展思路得以贯彻落实。

四、结语

为对导致博物馆持续变化的原因作较全面的分析,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博物馆化拓展”这个关键节点上。这是因为博物馆化拓展既是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与观念变迁的产物,又是刺激与推动博物馆各个环节进行变革的直接动力。在前一个环节,随着文明演进的精神性成长和社会变迁中收藏主体的扩张,人们得以从更广大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面理解物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记忆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博物馆化的拓展。在后一个环节,大批新成员给博物馆带来新的使命

与功能,使博物馆收藏活动自觉地打上传播与教育的印记。正是出于对传播与教育使命的有效履约,博物馆在众多方面展开了变革,包括组织机构、场馆硬件、展览建设程序、理念与方法以及展览评估和拓展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不必把博物馆变化视作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因素而惶然,相反,应将它们视为博物馆响应时代变迁召唤、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了解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观念和行动上的滞后之处,作出积极改变,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有更准确的判断和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使我们的建设行为更加清醒和自觉。

[1] Eilean Hooper-Greenhill.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

[2] 同[1]。

[3] 关于“博物馆化”的详细评论,可参阅[法]安德烈·德瓦雷、方斯瓦·梅黑斯指导,张婉真译:《博物馆学关键概念》,Armand Colin, 2010.

[4] Z. Stránský. La muséologiescience ou seulement travail pratique du musée. *MuWop/Do Tram*, 1: 22, 24. 转引自张婉真:《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历程谈法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学博士课程开设意义》,《博物馆学季刊》2004年第3期。

[5] S. Pearce. *Archaeological Curator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6.

[6] [奥地利]弗德利希·瓦达荷西著,曾于珍等编译,张誉腾审校:《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的观点》,台湾五观艺术管理公司2005年。

[7] 直至今日,以此定位的博物馆依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8] 由于古代中国很早就处于统一的王朝统治下,并采用郡县制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所以撰写志书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但以区域为单位的机构性收藏却不曾建立起来。

[9] B. Gilman. *Museums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 Edited by H. Genoways, M. Andrei. *Museum Origins: Readings in Early Museum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07-115.

[10] 目前中国大陆尚未有效开展上述三大评量,尤其是形成中评量既没有进入建设流程,也没有相应的资金保障,造成大量设计缺陷进入终结产品中。参见[美]凯瑟琳·麦克林著、徐纯译:《如何为民众规划博物馆的展览》,台湾海洋生物馆2001年;徐纯:《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理论的关系——以博物馆展览为视角》,《东南

文化》2011年第2期等。

The Expansion of Musealization: Reason, Process and Results

YAN Jian-qiang MAO Ruo-han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People have special feelings and emotions for some objects because they have discovere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namely the “museality”, of these objects. The essence of collecting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the museality of the objects and taking them out from their original context by means of “musealization”, thus transforming them into “museum objects”. With the deepening of human cognition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cting activities, peopl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discovering the museality of objects,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museum objects in terms of their quantity and diversity. This process is defined as “the expansion of musealization”,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is expansion has resulted in the birth of diverse types of museums. In addition, as the value of the objects as a carrier of meanings is being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nd institutional collecting becomes the mainstream, museum objects are regarded as a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 and endowed with a higher mission, which profoundly changed the functions of museu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museums and the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d approaches of exhibitions making have also changed.

Key words: museum; musealization; museality; collection; museum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黄 洋;校对:张 蕾)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古籍文献》出版发行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古籍文献》由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编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本书为8开精装本,有正文369页,定价1680元。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是一部以南博文物藏品为对象编辑出版的大型综合文物图录,资料翔实、图版高清,具有研究价值、鉴赏价值,也是南博建院以来第一次成系统规划出版的大型综合图录。已经出版的《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有:《明代吴门绘画》《明代娄东虞山绘画》《明代扬州绘画》《明代常州镇江绘画》《历代织绣》《清代官窑瓷器》等。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古籍文献》一书遴选南博所藏古籍文献精品编撰而成,内容包括晋唐写经,宋元刻本,明刻本,清代刻本、抄本和稿本,明清舆图等几部分。南博所藏三十余万册(件)古籍及文献资料中,古籍珍善本有两千七百余部,文献资料中的珍品逾千件。它们是南博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与古籍文献相结合,互相生发辉映,构成了南博物院藏的鲜明特色。珍藏之,研究之,生发之,可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们今天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和力量源泉。

(南京博物院)